

# 随缘集

趙樸初題



華夏出版社

# 随缘集

——夏宗禹書札

趙樸初題

華夏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随缘集/夏小希编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9.5

ISBN 7-5080-1861-3

I. 随… II. 夏… III. 散文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7232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3.5 印张 315 千字 5 插页

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 册

定价:23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

夏宗禹(油画·大陆作)



1979年初在北京



1937年在河南南阳



1943年在四川南充



1946年在四川重庆



1951年在河北石家庄

## 与友人留影

1951年春与丰子恺先生在重庆



1988年与李济生在上海

九十年代初与圆拙法师在北京



八十年代与巴金先生在上海

八十年代初与叶圣陶先生在北京。左为夏小希





七十年代中（前排左起）张孟恢、程  
光锐、张彦，（后排左起）夏宗禹、  
刘火子、徐亦安在北京



八十年代初与蒋闻仙在重庆



八十年代初与杨钟岫在四川

1985年(左起)梁柯平、陈国良、夏宗禹、刘火子、徐淡庐在重庆



八十年代初与尚莫宗在四川



## 与家人留影



1943 年与母亲王玉珊在四川



1950 年在家乡与父亲夏振北，  
母亲王玉珊、兄弟夏永合、夏合泰以  
及家人在一起



1950 年与兄夏永合（中），  
弟夏合泰（左）在家乡



1972年与邹德卿婆婆、女儿小希在南京



1980年与女儿小希在家中



1994年10月与女儿小希、女婿大陆、外孙小雨在北京



1995年3月与小雨在家中



友人手迹



夏宗禹 1985 年至 1995 年编著《君子书》



宗禹手迹

## 出版说明

夏宗禹先生(1921.2.21~1995.5.22),原名永昌,又名景凡。河南禹县(今河南禹州市)人。夏先生早年即投身文化活动,长期致力于新闻出版事业,先后在重庆《商务日报》、《石家庄日报》、《新观察》杂志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新疆日报》、《新疆画报》、《市场报》等处任职。龟勉从事,成绩卓然。晚年潜心搜辑近世名家墨妙,穷十年之功于《君子书》之编纂,有《弘一大师遗墨》、《马一浮遗墨》、《叶圣陶遗墨》、《丰子恺遗作》四种行世,蔚然大观,享誉文苑。又有《弘一大师写经集》、《巴金随想录》线装本等先后编印,亦品高文精,风行海内。

夏宗禹先生一生,雅好交游,广交书缘,友人函札往来甚夥,其中不乏出诸近世文化、出版界名家之手者。内容或议论人生,兼抒友情;或磋商书稿,探究学艺,而大多文与书俱佳。兹选夏先生为《君子书》所著编后记、前言和与友人往来函札结为《随缘集》。一则求为研究近世文化、出版史保存若干弥足珍贵之资料,一则求为彰显夏先生之风范与业绩。

《随缘集》分两种版本。一版为线装本(1996年华夏出版社出版),收编五十通书札手迹及部分文稿手迹,依年代先后编次;一版为本版本,收编部分文稿及三百三十五通书札,编排体例按夏先生与通信人的姓氏笔画编次。其中部分书信原件已佚,现以草稿补代,并予注明。书中注释为编者所注,有不当之处,敬请识者指正。

## 序

袁 鹰

夏宗禹(景凡)兄去世经年,一直要写点什么而终于一直未写,总不相信这是事实,总以为他还同过去那样,隔不多久就会忽然来个电话,说刚刚去了一趟上海、杭州或者福州,又见到巴公,又到哪儿去拍了些什么资料。那么个生龙活虎的人,怎么好端端的说走就走了呢?明知道近几年他的病情时有发作,不止一次带病从外地回京,每次见面分手时总是劝他注意休息,按时服药,不要拼命,尤其不能再挤公共汽车东奔西走了。他也总笑嘻嘻地说“没事”,有一次还说女儿女婿早就给他一笔“巨款”,再三叮嘱只供出门时“打的”专用,不许存银行,对小辈的孝心颇有得色。怎么最后仍是躲不过病魔的袭击呢?那天到他寓所吊唁,面对遗像,恍惚间仍觉得他只是临时发病住院,几天后又会拎一大包书稿图片复印件,兴致勃勃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。

宗禹兄长我六七岁,抗日战争时期就离家在大后方投身进步文化和新闻工作,同一些老一辈文化人早有交往。但我直到五十年代中他由《新观察》调来《人民日报》时才开始熟识。他的年纪比全文艺部人员都大几岁,因

此都称他“老夏”。老夏犹如一团火，全身有使不完的劲，头脑里有涌不尽的点子。翻着翻着本报或外地报刊，忽然就会冒出个主意，想到一个什么题目可以请谁写一篇文章，说干就干，立即打电话，撂下电话骑上自行车就出发。1958年“大跃进”中，“人人写诗”成风，有一天副刊上发表一组《孩子的诗》，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诗里有两句：“一心超过杜甫诗，快马加鞭赶郭老”。我们在“编者按”最后小小地将了郭老一军：“他们是会超过我们一代诗人的，不知郭老和其他的诗人们以为如何？”老夏放下报纸，立即去郭老家，请郭老写了一篇《读〈孩子的诗〉》，隔天就见报。这种硬逼作者的做法，未免过分，不足为训，但当时郭老本人和我们编辑都是很开心惬意的。当年秋天，他随田汉、梅兰芳等同志去福建慰问前线战士，正值炼钢高潮，田老沿途写了不少诗，有一首歌颂漳州农村的小高炉，有句云：“炼钢何惜相思树，一寸相思一寸钢。”砍伐名贵树种烧火炼钢，有悖于自然保护，也是不该提倡的，那时却也平常，我们且都认为这两句是神来之笔，赞赏倍至。编辑部内也有自诩马列水平很高的人，常指责老夏为“海派”，有“资产阶级办报作风”云云，我心里很不能苟同。那类帽子合适与否先不论，肯实干苦干又能联系群众联系作者的人，无论如何，也比说空话唱高调指手划脚的人可贵可爱也可敬得多。

1959年下半年，“大跃进”的狂热虽还在持续中，灾祸的阴影在不少地区已现端倪。老夏去了一趟河南禹县家乡，回北京后，心情明显地抑郁沉重。在部里开会汇报见

闻时,尤其在闲谈中,他多次讲到农村粮食匮乏和干部作风问题。“放高产卫星”是由上面的高指标层层压出的,牛皮越吹越大。他详细叙述亲眼见到的“盛况”:到处倡行“吃饭不要钱”,村子里当街排一长溜桌子,摆上大盆大盆馒头和菜,任何人包括过路人都可以坐下来吃个够,说声“谢谢”就走。他不止一次担忧地说:“这样吃法,有多少粮食吃不完!”各级党政领导,为了邀功请赏上报纸,瞒上压下成风,老百姓有苦难言。我们听了,发热的头脑似乎稍稍冷却些。到了传达庐山会议以后,突然兴起“反右倾”风暴,他这些如实反映的真情和忧心忡忡的实感,免不了都成了对“三面红旗”的动摇乃至歪曲的“右倾言论”,捍卫马列主义的人揭竿而起,大肆挥舞。会场上老夏常是沉默无言,不作申辩也不作检讨。我知道,这时候他的心情是痛苦的,那些尖锐的言词和胡乱上纲的斥责,他并不放在心上,他眼前浮现的是家乡父老兄弟脸上的菜色和诉告无门的恹惶。

六十年代初,“反右倾”运动后,他奉调去《新疆日报》,有的朋友在信中怅然地称之为“远戍轮台”。他离京时我曾以“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何人不识君”两句唐诗赠别,写的也是实情,北京上海等地许多上了年纪的作家都同他很熟,不仅由于他是报刊的老编辑老记者,更由于他是一位可以谈心、可以信赖的朋友。老夏对远离京城似乎并未引起太多的伤感。换了环境,也换了心情,1961年秋我在乌鲁木齐见到他时,他似乎又恢复了前几年那种乐观和干劲。“文革”恶风漫天卷地以后,消息沉沉,我

有时倒想，幸而他远处边陲，如果仍在北京，还不知会有什么遭遇，至少同我一起关进“牛棚”是免不了的，一顶“漏网右派”的现成帽子早在等着了。

到了“文革”后期，他接受了新疆领导人交下编纂大型画册的任务，又开始风尘仆仆于乌鲁木齐、北京、上海之间，工作条件艰难而仍然乐此不倦。将唯一的爱女留在南京托给一位善良的老婆婆照顾，自己倒来去无牵挂了。有一次我去南京，受他之托去看望小希，给老婆婆送点钱去。小希那时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，冷冷清清地跟老婆婆过日子，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，看了使人心酸，倒也磨练了她坚强的性格和独立处世的能力。那年代，有人热衷于造反夺权，膨胀私欲；有人无可奈何地逍遥遁世，蹉跎岁月；有的人遭逢厄运，家破人亡。老夏却忍受精神的折磨和身体的劳累，在夹缝中利用可以利用的有限条件，编出《新疆》、《天山》这些画册，于乱世中默默地干些实事。七十年代中一次在上海遇到，夜晚漫步外滩，我说他这样长途奔波太辛苦了，他苦笑着说：“总不能白吃人民供养的粮食吧！”

十年内乱结束，老夏回到北京，工作尚未正式安排的时候，先着手编周恩来同志的诗选和留学欧洲时的早期著作，接着又编别的书刊。十几年来，无论是在哪个工作岗位还是离休，他总是一如过去的劲头，不停地编书，一本又一本，搜集和抄录资料，找印刷厂，发稿校对，都自己动手，仍是像一团火。他心里想的手里干的，都是编书。真是：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书消得人憔悴。用他给友人

信中的话说：“如果还算做了一点事，可以算作单干的好处。不上班不受日常办公和当官人的限制尚可做点有益的事情。”

八十年代中期，他开始策划一项大的举措，编纂弘一法师（李叔同）、马一浮、叶圣陶、丰子恺四位文化大师的遗墨，搜罗编辑四家诗文、书画、金石精品，精编精印，汇为一函。他说过：“我编的这套遗墨丛书，选的都是博学多才、文化事业上有重大贡献的道德高尚、不谋荣利的正人君子，统称为《君子书》，由华夏出版社出版。”为了这套《君子书》，他年复一年地孜孜矻矻，席不暇暖。从确定内容，取舍稿件，复印手迹，安排版面，设计装帧，校对文字，直到用多少磅的铜版纸，用什么料的封面，什么样的环衬，他都考虑再三，具体细致，一丝不苟，不知耗费了多少晨昏、多少心血。这套高品位可传后世的图书，编纂、装帧、印刷都精美绝伦。他一手操持编选、复印、画版、校对，事无巨细，一丝不苟。四位大师的友好、弟子、亲属都给他热情的鼓励和细心的帮助。连年奔波，积劳成疾，顾不上治病。他给友人信中说：“编印这几本书，居然用了八年时间，可谓老牛！现在，时间也跑得太快了，感慨不已。”一本《马一浮遗墨》，前后就历时三年。这八年中，我们常常见面商量，春去秋来，岁月在不知不觉中流水般逝去，我却分明看见衰老的影子悄悄地爬上他的双鬓和面颊，更不用说他的心脏病和痔疮都日益加剧了。

然而他总是乐观而开朗，他的乐观开朗的情绪也常常感染了我。有时，他意外地发现一件马一浮老人或者